

古詩十九首集釋



古詩十九首集釋

隋樹森編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 6印張 · 62,000字

1955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上海第4次印刷

印數：8,501—16,500 定價：(9) 0.70元

統一書號：10018.1 55.3條,溫型

序

古詩十九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古代的四言詩在周朝充分的發達了以後，詩界便漸行沈寂，直到新體的五言詩起來，纔又另現出一番燦爛與光輝，而古詩十九首便是這五言新體詩的星宿海。它一方面繼承了詩三百篇，一方面又開了建安魏晉的五言詩的風氣。它的藝術價值也到了純熟的境界，它既有完整優美的外形，復有豐富充實的內容，而表現的方法，特具的風味，更是妙得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它是五言詩的規範，後來的詩人，不但多受其影響，並且還有許多作家，如陸機劉鑠謝惠連鮑照鮑令暉江淹沈約孟浩然韋應物楊億洪适陳襄張憲王闔運等，都有擬作，如果把這些詩收集起來，數量當也不少。這寥寥的十九首詩，真抵得上後來無數的篇什，所以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沒有不喜歡讀它的，鍾嶸評爲『一字千金』，決不是過分推崇之語。

古詩十九首因爲離我們的時代較三百篇爲近，所以讀起來比三百篇也容易懂，但是要想到對於詩的脈絡及字句的意義洞澈的了解，也還有待於箋釋。茲爲便於一般讀者起見，所以勉強的來擔當了這件工作，編了這部小書。這部書共分攷證箋注彙解評論四

6712 113

卷：『攷證』乃論十九首產生的時代，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劉勰『比采而推，兩漢之作』的話，最爲可信，所以持論卽以此爲歸宿。『箋注』則多集李善五臣以來諸家之說，事義兼釋，務求詳備。每詩之下，復附以評說，以爲鑑賞之助；惟見仁見智，勢難盡同，故雖有抵觸，亦兼採而並收。『彙解』輯有劉履古詩十九首旨意、吳淇古詩十九首定論、張庚古詩十九首解、姜任脩古詩十九首釋、朱筠古詩十九首說、張玉穀古詩十九首賞析、方東樹論古詩十九首、饒學斌古詩十九首詳解等篇，諸家之說，時或不同，迂曲之論，亦復多有，然作者體味詩意，揭發奧蘊，善言可取者，却也不少；何況詩無達詁，只要言之成理，我們都不妨一讀。並且這幾篇東西，有的頗不易得，現在把它們彙集起來，對於愛好十九首的人，想來多少總是有些方便吧？（此外還有金聖嘆的古詩解，陳沆的詩比興箋論十九首之部，姜炳璋的古詩億等篇，因其內容似不如以上諸篇，故未收錄。）『評論』則多採自詩話詩選，此亦有助於讀者之研究與鑑賞；至其得失，則待讀者自決，不再加以辨析了。

這本書雖沒有許多自己的發明，但參考抄集，擷撻摘取，也頗費了些精力，然亦未知有助於研究古詩十九首者否耶？書中謬誤，當所難免，讀者如肯賜教，以便將來訂正，至爲榮幸！一九三五年冬隋樹森序。

古詩十九首集釋 目次

序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一 考證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二 箋注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三 彙解

(一)古詩十九首旨意

(二)古詩十九首定論

(三)古詩十九首解

(四)古詩十九首繹

附古詩十九首繹序

又附古詩十九首繹後序

(五)古詩十九首說

目次

上虞劉履坦之

隴陽吳淇伯其

秀水張庚浦山

如皋姜任脩自芸

如皋姜任脩自芸

吳興王康

大興朱筠竹君

古詩十九首集釋

附古詩十九首說序

又附古詩十九首說序

(六)古詩十九首賞析

(七)論古詩十九首

(八)古詩十九首詳解

附古詩十九首詳解序

又附古詩十九首詳解書後

(九)古詩十九首注

後記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四 評論

二

平陽徐 昆后山

嘉定錢大昕 竹汀

吳縣張玉穀 蔭嘉

桐城方東樹 植之

旌德饒學斌 勉庵

寶應王凱泰

旌德饒書升

咸陽劉光寶 古愚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一 考證

一

近來一般研究文學史的人，多半都把古詩十九首定爲東漢之作——認爲在西漢時，五言詩還不能產生——不過我覺得這種說法也還難成定論。古詩十九首中固然有許多是東漢的篇什，但却也不能說其中絕對沒有西漢的產物。

二

把古詩十九首定爲東漢以來的作品的，他們所持的理由很多，最重要的大概有六種：(1)西京遺翰，莫見五言，故十九首非西漢作品。(六朝時人說，見文心雕龍) (2)十九首用字有觸西漢皇帝諱者，故非西漢人作。(顧炎武說，見日知錄) (3)十九首中有樂括樂府而成者，故非西漢人作。(宋彝尊說，見玉臺新詠跋) (4)「促織」之名，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至漢末緯書始見此名，故十九首必非西漢人作。(徐中舒說，見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 (5)西漢有「代馬」、「飛鳥」對舉的成語，然並不工切；東漢則有以「胡馬」、「越燕」對舉者，有以「代馬」、「越鳥」對舉者，均較工穩。十九首中亦有「胡馬」、「越鳥」之對，其非西漢人手筆可知。(同上) (6)洛陽之洛，在西漢人書中多作雒。據魏略及博物志謂漢於五行屬火，忌水，故改「洛」爲「雒」。魏屬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又復原字。據此

則洛字爲兩漢人所諱，不應用，而古詩有「遊戲與洛」，可知此詩必作於漢魏間也。（胡懷琛說，見古詩十九首志疑。）不過我覺得這些理由並不充分，還不能把五言詩發生的時代決定爲東漢；現在先把這些理由加以檢討。

懷疑五言詩產生時代的舊說的人，每引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於後代也。幾句話，認爲今所見的西漢五言詩，簡直都是贗品。但是在這裏我們須要注意：劉勰說的是辭人遺翰，莫見五言，十九首是無名氏的作品，並非出於辭人，當然是可以有的。其次，還要知道劉勰他自己已認爲五言詩在西漢已經產生了的，因爲他還有「古詩佳麗……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的話。復次，成帝品錄也不能說沒有五言（註），即使成帝品錄，不見五言，也不能說西漢就沒有五言詩，因當時之詩，必有許多爲漢志棄而不錄的，那些詩中焉知決無五言？且自周以來，即代有五言，也足證西漢時有產生像古詩十九首那樣詩歌之可能。如詩經之中，不但有許多五言的單句及連續至二句三句者，且還有通首爲五言者，如魏風十畝之間云：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即是。不過也許有人要說：這類的詩，句中有「兮」字，「兮」字是助聲之辭，不能算入字數，所以這種詩並非五言詩。是的，這話也是一理，那麼再找其他的例吧。詩經大雅緜第九章云：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余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這是沒有兮字的五言。這兩種詩，詩經中也還有些，我們無論承認它們都是五言也好，或只承認後者是五言也好，總

之周代是有五言詩的。自此以後，五言詩仍是接着產生，如孟子離婁篇引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也是五言詩。這首詩中雖有「兮」字，但却如劉勰所云，實是五言的「全曲」，因為這首歌是以「清」與「纓」爲韻，「濁」與「足」爲韻，並不以兮字爲韻，足證兮字完全是表聲的，並不入「句限」。又水經注引物理論曰：秦始皇起驪山之家，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

生男慎莫舉，生女嗃用餽。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

這不也是五言嗎？

再就西漢來說，我們姑且承認蘇武李陵卓文君班婕妤等人的詩出於後人依託，但也還能證明當時是有五言詩的。楚漢春秋中載有虞美人答項羽的歌，歌云：

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這不是與其他漢詩很相類的五言詩嗎？這首詩有人疑爲僞作，並非出於虞姬之手；但即使這首詩是僞作，它的時代却仍然很早，因爲據漢書藝文志云，楚漢春秋是陸賈所記。陸賈是漢朝初年的人，這首詩總是漢初的作品了。又李延年是武帝時的協律都尉，他有一首很有名的北方有佳人歌云：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這歌除了無關重要的「寧不知」三個字，便是一首完全的五言（玉臺新詠即作「傾城復傾國」，如此便是純五言詩。）不僅是五言，而且它的韻味與十九首很相近。又漢書賈禹傳載武帝時俗語曰：

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

這也是五言。宋書樂志載漢饒歌十八曲中的上陵，是宣帝時的產物，其中也有許多五言句，如云：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廿
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也是與十九首很相類的五言詩。又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云：

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尹賞傳載成帝時長安中爲尹賞歌曰：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這也都是用五言作的。此外那時的民謠樂府之中，也還有此類作品。所以我們即使懷疑蘇李等人之詩，但却不能說西漢沒有五言詩。西漢既有五言詩，當然也能產生十九首一類的作品。

認爲十九首非西漢作品的，還有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詩中的「盈」字觸諱。顧炎武云：

孝惠諱盈，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可知爲後人僞作，而不出於西京。

顧氏所說的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即是古詩十九首之第十首「迢迢牽牛星」那首詩；十九首除了這首之外，還有第二首中的「盈盈樓上女」，第九首中的「馨香盈懷袖」也都是句中有盈字的。但是詩中有觸諱之字，並不能證明其必非西漢之作，因爲漢人的文章中觸諱的地方很多，就以觸「盈」字的而論，即已不少，例如賈誼陳政事疏曰：「秦王置天下於法令，而怨毒盈於世；」鄒陽上書吳王曰：「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韋孟在鄒詩曰：「祁祁我徒，

負載盈路」等都是古直漢詩研究列舉漢人詩文觸盈字諱者有數十則之多，難道這些詩文也都是後人擬作嗎？古人有「臨文不諱」之說，所以有盈字並不能斷爲決非西漢人所作。

古詩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一首，因爲與樂府西門行的字句相同者頗多，所以朱彝尊玉臺新詠跋便說這是文選樓諸學士裁剪長短句而作成的，但這也不成理由，錢大昕會加以駁正，他說：

……或又疑生年不滿百一篇樂括古樂府而成之，非漢人所作，是猶讀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鳴之出於是也，豈其然哉？

據我們以理推測，樂府與詩有相同的地方，總是樂府在後，因爲詩可入樂的，詩入樂而不合節奏，於是乃加以增損。如楚辭有山鬼篇，宋書樂志便有增減其字句而作成的，今有人曹植的七哀詩，宋書樂志亦有增加其字句而作成的，月篇這都足證樂府中有改易他詩字句而成者。西門行當然也是與此情形相同，是改易古詩而成的。

「促織」之名雖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但因此便斷定明月皎夜光一詩爲西漢以後的作品，理由也是不充足的。因爲爾雅方言等書，材料並不多，決不能把當時所有的草木鳥獸等物的種類及其異稱都完全記載在裏面；卽在今日，我們也不能說從所有的書籍辭典之中，就能把現在中國各地草木鳥獸的種類及其異名都找出來，不用說爾雅方言那種極不精密的書了。並且漢賦中的動植物之名，就有不見於爾雅方言的，如枚乘七發「澗章白鷺」之「澗章」當爲鳥名；「激溲壽蓼」之「壽」當爲草名；司馬相如上林賦「漸胡穀」之「漸胡」與「鶻」當係獸名；然爾雅方言均無記載。其他類此之例尙多，但決不能因此便懷疑那作品的時代。再說東漢以前的古書亡佚的很多，我們焉知在那些書中也無「促織」二字？復次，緯書中既有促織之名，緯書是兩漢之物，卽算是東漢的那麼東漢

既有此名，而此物又非那時來自他國者，我們也無法證明這個名詞即創於東漢。

從「胡馬」、「越鳥」的對偶證明古詩十九首是東漢的作品，理由也不充足。對偶是中國文學的特色，在很早的典籍如書經、易經之中就有，楚辭及西漢的文章辭賦中對偶非常工緻的很多，如「朝搴」「夕攬」，「滋蘭」「樹蕙」，「壓露」「落英」，（見離騷）；「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見過秦論）；「鸞鳳伏竄」「鷲泉翱翔」（見弔屈原賦）；「保母」「傅父」，「荆山」「汝海」（見七發）；簡直的不勝枚舉。如說西漢的作者還沒有達到以「越鳥」對「胡馬」的程度，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如說西漢有不很工切的「代馬」「飛鳥」的對偶，同時便不會再有工緻的「胡馬」「越鳥」的對偶，也是沒有理由。何況我們即使承認有胡馬越鳥的行行重行行一詩爲東漢人作，也不能證明古詩十九首全是東漢的作品，因爲這十九首詩本非一人一時的產物！

至於青青陵上柏一詩，李善疑爲東都之作，說本明通，然從「遊戲宛與洛」的洛字證明此詩作於漢魏之間，便不成理由了。段玉裁說文注云：

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澗，雍州其澗，涇，洛」……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於魏。裴松之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此丕改雒爲洛，而又妄言漢變洛爲雒，以掩已紛更之咎，且自詭於復古。自魏及今，皆受其欺。……自魏人書雒爲洛，而人輒改魏以前書籍，故或至數行之內，「雒」

「洛」錯出。即如地理志引禹貢既改爲洛矣，則上雒下曰：「禹貢雒水」，不且前無所承乎？……

這樣看來，禹貢伊洛之洛本應作雒，與涇、洛之洛是兩字，洛陽之洛作雒是應該的，但並非因漢諱用洛所改。此詩未作

「籩」我們如對它懷疑，亦應持此理由。但以段氏之說推之，此洛字恐係魏人所妄改，不足爲證。我們試翻兩漢人書，如史記周本紀贊「洛邑」兩見，漢書游俠列傳「洛陽」數出，難道我們也能說史漢「洛」不作「籩」，必成於漢魏之間嗎？

總之，把古詩十九首定爲東漢人作或漢魏間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充分的。

三

把古詩十九首都認爲西漢以後的作品，既是沒有理由，那麼它究竟是什麼時候的產物呢？我覺得還是把它認爲出於兩漢無名氏之手，較爲妥當。

劉勰文心雕龍論到古詩的時代，說：「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昭明編文選時，以失其姓氏，所以把它放在蘇李詩之上；鍾嶸詩品說，「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李善文選注說，「辭兼東都，非盡是乘；」這都是十九首爲漢詩或認爲兩漢之詩的。我覺得兩漢之說最爲可信，我們從十九首中也能得到證明，如第七首云：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李善文選注說：「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又說：「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按：漢書張蒼傳云，「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武帝本紀云：「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這就是說秦用建亥歷，（以十月爲歲首，十月亥月也。）漢初仍之，至武帝太初元年始改用建寅歷，相差正是一季。特

中敘時令爲孟冬，但還有促織與蟬，這孟冬當然是武帝太初以前的孟冬，實卽後來的孟秋。李善據漢書而定明月夜光一詩爲西漢太初以前的作品，是很對的。又第十六首云：

凜凜歲暮，蟋蟀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

嚴冬歲暮而有蟋蟀悲鳴；「孟秋之月，涼風至。」（禮記月令）涼風是秋天的風，而此詩敘歲暮始云涼風已厲，遊子無衣，那麼這所謂歲暮，當係夏歷八九月的時候，故此詩也是成於太初以前的。又第十二首云：

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

歲暮而有萋已綠的秋草，這也足證爲太初以前的詩。

十九首中雖有西漢之詩，却也有東漢人所作者；如第三首云：

驅車策鷩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李善注曰：「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又說：「秦實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李周翰注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呂延濟注曰：「洛陽有南北兩宮，相望七里。」這首詩講到洛中冠帶，王侯第宅，兩宮雙闕，這當然是詠東都者，卽成於東漢人之手了。又第十三首云：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李善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河南郡圖經云：「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朱琯文選集釋云：「上東門乃洛陽之門，……長安東面三門，見水經注，無上東門之名。」又云：「李善注引風俗通曰：『葬於北郭，北首，求諸幽之道也。』」案詩所言非泛指，蓋洛陽北門外有邙山，冢墓多在焉，則此卽謂北邙山之墓矣。」案此詩上東門既是洛陽城門之名，而

北邙自後漢建武十一年城陽王祉葬此之後，遂爲王侯卿相之墓地，所以這首詩也是東漢的作品。

我們再從古詩所表現的思想來看，也可知道有東漢之作。如第四首今日良宴會云：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鬮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轆轤長苦辛！

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疏云：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壘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第十五首生年不滿百云：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及前已定爲東漢之作的青青陵上柏云：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極安娛心意，感感何所迫！

驅車上東門云：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服美酒，被服統與素。

這些詩都表示出悲觀、厭世、憤懣的思想，要求剝那間之快樂於醇酒高梁中之主義；這種不得已而要儘量享樂的辦法，都是亂世之音的表現，所以這些詩總是桓靈以後的作品了。

又第十七首孟冬寒氣至云：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此詩首言孟冬，下云「北風何慘慄？」又云「夜長」，這孟冬景象便與明月皎夜光一詩所寫的孟冬不相同了。所以這孟冬便是夏歷之孟冬，此詩當係太初以後的作品。

這樣看來，古詩十九首非一時的產物，是很明顯的；既非一時的產物，當然也就非一人所作了。蔡條西清詩話云：「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沈德潛說詩碎語云：「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我覺得他們所說的都是很對的。

四

如上所云，古詩既是兩漢人作，那麼究竟出於何人之手呢？這却是無法解決。舊來把十九首中一部分的詩指出作者來，那是很不可信的。現在先把諸說列出，然後再加以分辨。

(1) 枚乘傳毅說——文心雕龍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徐陵玉臺新詠以文選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爲枚乘作（玉臺枚詩尙有蘭若生春陽一首）。

(2) 曹植王粲說——詩品云：「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

(3) 張衡蔡邕說——藝苑卮言云：「……宛爲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室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

但這都是傳說與推測之詞，並無真憑實據。劉勰對於枚乘之說，已是不甚相信，所以他說「或稱枚叔」，而與氏同時的昭明太子及鍾嶸，也都不信此說。昭明文選把這些詩總題爲「古詩」，不加主名。詩品說：「古詩妙選，人世難詳。」又說：「枚馬之徒，吟詠靡聞。」這也是不以枚乘說爲然的。並且文選所載晉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玉臺所稱枚詩九首均已擬及，劉休文的擬古二首，所擬亦在玉臺枚詩內，但陸劉兩家都不說「擬枚乘詩」，而曰「擬古詩」，亦足證十九首本係古詩，並無主名。至於傅毅張衡蔡邕曹植王粲之說，也都不過是「想當然耳」，決不足信的。

五

五言詩西漢便已產生，爲什麼西漢有名的作家却不用它呢？這大概是因爲五言體起於民間，歌謠樂府用得較多，而一般人多輕視它，所以辭人文士或不肯採用，或試作而不署其名的緣故。摯虞文章流別論云：「五言者……於俳諧倡樂多用之。」我們看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除了「寧不知」三字，通首便是五言，而李延年全家即都是倡優之流。文心雕龍說「辭人遺翰，莫見五言」，這也是說作家不用五言，俳諧倡樂以及民間無名詩人自有採用的。漢代的許多五言樂府，究竟是東漢西漢，就很難斷定，也許其中就有不少的西漢作品呢！

到了東漢，因爲五言詩在民間已經流傳了若干年，所以這種體裁漸爲盛行，如蔡邕之飲馬長城窟行，翠鳥，秦嘉之留郡贈婦詩，張衡之同聲歌，蔡琰之悲憤詩，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嬌嬈……都是五言了。先有了西漢的無名氏的作品（古詩十九首中僅有一部分），再慢慢的醞釀，然後才有東漢這些詩，否則把五言詩作爲在東漢突然產生，立即暴盛成熟的文學，也是不很合理吧。試就七言詩來看，由楚之騷賦，漢初之歌謠慢慢的演變，直到魏晉才